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2.024

苏轼对待“小人”的态度及哲学依据*

徐建芳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秉承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的陶铸,苏轼自小养成了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君子人格,对损人利己的小人深恶痛绝。但善于独立思考的苏轼在波谲云诡的宦海浮沉中也体悟到:小人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若不妥善对待小人,自己也绝无安宁之日。因此,为了国家社会的安泰稳定,除了应以渐变的方式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小人铲除外,其他那些有一善可取的小人则应予以教化、引导,争取使之走上正途。苏轼这些真知灼见的哲学依据主要来自《周易》的阴阳哲学。

关键词:苏轼;小人;《周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1-0130-06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君子与小人常常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作为君子必须爱憎分明,对小人疾恶如仇。然而,现实的复杂、人性的多面、利害的多变等客观因素决定了采取这种二元对立的处世态度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还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深受儒家思想滋养的苏轼,自小养成了疾恶如仇的刚直性格,这使他在仕途上备受排挤迫害。波谲云诡的宦海浮沉使他深刻认识到这种传统对待小人的态度有很大的偏颇性。他依据自己的感悟及《周易》哲学理论,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对待小人的策略。这些策略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苏轼本是个忠心为国、刚直不阿之士,平生最不能容忍祸国殃民的小人。因为在他看来“小人

之情,非为朝廷之计……皆为其身之利也。”^{[1]2429}小人的本性是损人利己,甚至不惜损国利己。如《上神宗皇帝书》所论: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患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1]740}

秦朝的李斯因担忧扶苏继位之后任蒙恬为宰相,剥夺自己的相权,就违心地立胡亥为帝,结果秦王朝灭亡;唐代的卢杞因担忧李怀光揭发其劣迹,而阻挠唐德宗接见李,使李积怨生恨而再起叛

* [收稿日期]2010-11-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XJC751009);重庆工商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0855006)

[作者简介]徐建芳(1976—),女,河南南阳人;讲师,文学博士,在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乱。两者都因患一己之得失而导致国亡邦乱的历史事实使苏轼深刻认识到孔子之言的真理性:凡是患得患失的小人,必会使用各种卑劣手段去追逐利益并维护既得利益,甚至不顾国家的安危存亡。苏轼自己也曾亲身见过小人们祸国殃民的恶劣行径。如《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

(贾)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若非给事中范祖禹……犹肯为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论奏……则亿万性命,流亡寇贼,意外之患,何所不至。^{[1]935}

贾易等小人但务邀宠固恩、泄其私忿,不仅对苏轼本人极尽迫害之能事,而且置生灵涂炭于不顾,把苏轼为灾区人民请命的奏折故意压下;若非朝中其他忠贞大臣秉公论事,“则亿万性命,流亡寇贼,意外之患,何所不至”。可以想见,若小人执掌朝政,不仅君子无法立足于朝,而且天下百姓也将备受其祸,甚至会给国家带来不堪设想的祸患。

正因此,苏轼认为治国之本、君王之职就在于辨别君子与小人,并及时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如《论周穉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之二:

窃以为国之本,在于明赏罚,辨邪正,二者不立,乱亡随之。《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昔郭公善善恶恶而不免于亡者,以善善而不能去也。^{[1]832-833}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国之本,在于明赏罚,辨邪正”的观点,然后以《周易》哲学为理论根据,以郭公“善善恶恶而不免于亡”为事实论据,有力证明不能分辨邪正、及时进用君子、屏斥小人将产生的严重后果。又如《富郑公神道碑》:

天子无职事,惟辨君子小人而进退之,此天子之职也。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歧万辙,必胜而后已。小人复胜,必遂肆毒于善良,无所不为,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1]536}

天子唯一的职责就是辨别君子小人,然后果断地进用君子、屏退小人。因为两者若共居一朝,必水火不容。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小人不,则交结构扇,必胜而后已。小人复胜之后,必变本

加厉地残害忠良;要想天下不乱,岂可得乎?

综上所述,在关系到国家存亡、人民安危等重大事情上,苏轼对小人深恶痛疾、势不两立的。

二

然而,苏轼毕竟是一个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摸爬滚打过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智者,他认识到,小人是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的,若不妥善对待小人,一味地对所有小人都视之若仇、拒之于千里之外,则自己也绝无安宁之日。因此,他依据自己的体悟,提出了一系列切实稳健的对待小人的策略。如《续欧阳子朋党论》:

……愚以谓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恶而贷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故善除盗者,开其衣食之门,使复其业。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1]128}

《大臣论下》:

……小人之心中,自知其负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救也,则将日夜为计,以备一旦卒然不可测之患;今君子又从而疾恶之,是以其谋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谋深,则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若夫智者则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势;外以阳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间……然后待其发而乘其隙,推其坠而挽其绝……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君子小人,杂居而未决,为君子之计者,莫若深交而无为……昔汉高之亡,以天下属平、勃。及高后临朝,擅王诸吕,废黜刘氏。平日纵酒无一言,及用陆贾计,以千金交欢绛侯,卒以此诛诸吕,定刘氏……知此,其足以为大臣矣夫!^{[1]126-127}

《南安军学记》:

……庶顽谗说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恶莫若进善,故择其可进者,以射候之礼举之。其不率教甚者,则挞之,小则书其罪以记之,非疾之也,欲与之并生而同忧乐也。……其改过者,则荐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则威之、屏之、黜

之、寄之之类是也。^{[1]373}

《东坡易传》:

有用者用之,无用者容之不遐弃也,此所以怀小人尔。^{[2]25}

“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因此,对待小人不可一概而论、斩尽杀绝,而应适度容忍,区别对待:

(一)“治道去泰甚耳”

在苏轼看来,只要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小人除去即可,至于其他那些多少有些恶行的小人,则应该容忍他们的存在。但在铲除这些恶贯满盈的小人的方式上,苏轼主张采取渐变的方式,不可操之过急。因为小人清楚自己背负天下人的怨恨,君子绝不会饶恕他们;所以他们必将日夜计谋,以备卒然之患。如果君子不暂且容忍小人,反而嫉恨厌恶他们,则“其谋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谋深,则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所谓“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智者则不这样,他们对内巩固君子间的交往,以厚集势力;对外表面上不违逆小人之意,以等待时机成熟时再一举歼灭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成功灭除小人而使天下得到安定。当初汉高祖死后,陈平与周勃等就是采纳陆贾的这种计谋:平日纵酒嬉乐,与吕党“深交而无为”;等吕后一死,便顺利诛灭诸吕,安定刘氏。可见,君子要想除去小人,决不可急于求成;以免除患不成,反给国家、自身带来更大灾害。只有明白这层道理,才足以成为安邦定国的大臣。

(二)“有用者用之,无用者容之不遐弃”

对于那些“容之不遐弃”的小人,也要分出不同层次各自对症下药。那些有一善可举的小人应及时进用他,为天下恶人树立表率;那些极度不遵循教化者,就打他一顿以示惩戒;罪过小的就记下来,并不是嫉恨他们,而是希望他们知错改过;那些改过自新的就荐举、进用他们;那些怙恶不悛的,就施以威吓、屏退、流放等措施,但仍不放弃他们,使他们有悔过自新的机会。

(三)“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

苏轼认识到,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主要是为了结党营私、谋取富贵;就像盗匪之所以成为盗匪,主要是因为衣食不足;因此“善除盗者,开其

衣食之门,使复其业。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只要妥善安排,“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各自有了合适的安身立命之所,小人们便不会再兴风作浪、拉帮结派、制造事端。

三

苏轼所提出的对待小人的策略与他自小所受的易学熏陶有密切关系,其哲学依据可说主要来自《周易》的阴阳观。《周易》阴阳观的核心精神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命题蕴含三层意思:一,阴阳之间是相对的;二,阴阳之间是变动的;三,阴阳之间是合一的,这种既互相对立又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易道。它是贯通天、地、人的总规律,宇宙万物只有遵循这一规律运行才能获得顺畅完美的发展;否则,则可能引起各种祸乱。如李泽厚先生说:“《周易》认为整个世界是以‘一阴一阳’为始基的一个相反相成的有机统一体。在《周易》看来,只有在互相反对的双方贯通、联结、合作、平衡、统一的情况下,事物才可能得到顺利地发展”^{[3]279}，“只有这种平衡统一才能给世界带来安宁和快乐。相反,平衡统一的破坏必然要引起各种祸乱。”^{[3]274}可见,“一阴一阳之谓道”实乃宇宙万物生存发展所应遵循的首要律则。

《周易》阴阳观念贯彻于社会伦理领域中时,其象征意蕴之一即“君子”与“小人”。作为两大对立势力的“君子”与“小人”之间同样应遵循“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宇宙规律,既矛盾对立又和谐统一,如此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正因此,《周易》对待小人的态度相当灵活圆通。

在开国承家、治国安邦、外交征伐等重大事情上,《周易》坚决主张重用君子、屏弃小人。如《师·上六》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其《象》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言开国承家,需用君子,勿用小人;若用小人,必乱邦国。又如《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说明使国家中兴……只有具备文明之德、刚武之威的殷高宗那样的人才能担此重任……不要任用小人,若任用小人,国家不但不能既济,反而会更加丧乱。”^{[4]492}又如《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其《象》曰:“公用亨于天

子,小人害也。”王公向天子献礼致敬,要是小人当此大任必致祸害。孔颖达疏曰:“小人德劣,不能胜其位,必致祸害。”^{[5]78}可见,在重大事务上,《周易》对君子与小人的态度是有所轩轻的。

但在日常处世中,《周易》则主张君子与小人应和谐相处,不可水火不容。如《遁·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遁卦卦象是下艮上乾☰,乾天在上,艮山在下,犹如天远避山,象征退避。君子效此卦象当远避小人,虽不显憎恶之情但始终能矜严自守。余敦康先生对此作了详尽阐述:

由于君子与小人共同生活于社会的统一体中,鱼龙混杂,不可分离,所谓遁世,并不意味着弃绝小人而离群索居,退隐山林……而是指一种如何在乱世正确处理与小人的关系明哲保身的行为方式。因此,在小人得势的社会,君子应当采取明智的做法避免小人的迫害,但也不必憎恶小人,断然拒绝与小人交往,只是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保持严肃的态度……既不憎恶而又严肃,这就是合乎中道了。^{[6]173}

基于君子与小人不可分离的客观现实,采取既严守自己做人的准则又不憎恶小人的中道态度才是明智之举。又如《睽·初九》曰:“……见恶人无咎。”为什么接见恶人反倒没有咎害呢?孔颖达疏曰:“若标显自异,不能和光同尘,则必为恶人所害。”^{[5]162}余敦康先生解曰:

对于作为对立面的恶人,要有一个全面的观点,做到异中求同,不可偏狭固执,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而要主动接纳,扩大交往,因为只有通过交往的过程,才能捐弃前嫌,达到谅解,避免因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咎害。^{[6]196}

为避免矛盾激化而产生咎害,君子与小人均不可标显自异、褊狭固执、相互排斥;而应求同存异、彼此接纳、和谐共处;所谓“保合大和,乃利贞”(《乾·彖》)也,只有达到太和状态,才有利于万物的贞正发展。刘纲纪先生对此有精要阐发:

《周易》认为美在生命之中……而这种美的最高表现即是“大和”。因为只有在“大和”的状态下,生命才能获得最顺畅、最理想的发展……并且只有“大和”方能“利贞”……以“大和”为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以生命合规律的、和谐的发展为美,而且以各不相同的个体生命都能共同

和谐发展,以整个大自然和人类全体生命的兴旺发达为美。^{[7]69-73}

既然生命只有在“大和”状态下才能获得最顺畅、最理想的发展,而“大和”不仅包括个体生命的和谐发展,更包括整个大自然和全体人类的共同和谐发展,那么君子与小人的和谐相处也就是宇宙规律的必然要求了。

苏轼在研治《周易》的过程中受阴阳哲学启示也洞悟到:国家欲维持泰和安定的局面,君子与小人必须保持平衡和谐的关系;否则,国家将永无宁日。如苏轼解泰卦彖辞曰:

“泰”而后为“大壮”,“大壮”而后为“夬”。“泰”之世,不若“大壮”与“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圣人独安夫“泰”者,以为世之小人不可胜尽,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穷而无归,其势必至于争,争则胜负之势未有决焉,故独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为之措,然后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之所以为最安也。^{[2]24}

泰卦☰只有三阳爻,而大壮卦☰与夬卦☰分别有四、五阳爻,象征君子愈盛而小人愈衰。依常理,“泰”之世应该不若“大壮”与“夬”之世;但在《周易》中,“泰”之世却象征最安泰稳定之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周易》看来,世上的小人是不可穷尽的,若必欲逼迫驱逐之,使之走投无路,必将激起小人的致死反抗,两者争斗则胜负难以预料。而泰卦是三阳爻居内,象征君子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着控制权;三阴爻居外,象征小人拥有安身立命之地,不会因无所措手足而铤而走险,这样祸患便无由而起。这就是泰卦之所以象征最安泰稳定的原因。苏轼对泰卦的这一创造性阐释表明,他的确洞悟了君子与小人间平衡和谐对于维护社会安定的至关重要性。

而且,在苏轼看来,小人的存在虽说是一种负面因素,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君子的发展其实也是一种极大的促进因素。这种真知灼见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大过卦彖辞的传解中:

《易》之所贵者,贵乎阳之能御阴,不贵乎阳之陵阴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阴之过乎阳之为祸也,岂知夫阳之过乎阴之不为福也哉!立阴以养阳也,立臣以卫君也,阴衰则阳失其养,臣弱则君弃其卫……^{[2]52}

《周易》所贵尚的是阳能控驭阴,而不是凌驾于阴而忽略之。人们一般只知道阴的势力过盛会带来祸害,却不知道阳的势力过盛也不为福祥。因为设立阴是用以奉养阳的,设立臣是用以护卫君的,“阴衰则阳失其养,臣弱则君弃其卫”。可见,阴的存在对于阳的确是不可或缺的。易言之,小人的存在对君子是极其重要的。这种观念也渗透在苏轼对《无妄·九五·象》“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的阐释中:

善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于尽丧。无妄者驱人而内之正也,君子之于“正”,亦全其大而已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全矣。……“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养其大正也,乌可药哉!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故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2]48}

真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会以一种尺度去苛求芸芸众生,若这样去要求必将尽丧天下。无妄卦象征无妄为,所有人都应遵循正道而行;但君子对于“正”有一个标准——“全其大而已”,保全大节即可,不必苛求于细枝末节。无妄之世有疾,象征在“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而这些“小不正”是用来养“大正”的,因此无须药疗。若以“不妄为”为药来疗治这些“小不正”,则是以“至正”

荼毒天下,天下必将永无宁日。所以说“无妄之药,不可试也。”这里的“大正”、“小不正”其实就是阳与阴、君子与小人的另一种指称而已,其所表达的的宗旨仍是强调阴的存在对于阳是有利的,不可除去。

综上所述,苏轼所提出的一系列对待小人的策略既来自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磨炼,也源于他深厚的哲学理论修养,具有切实的指导性、可行性、真理性。对于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2] [宋] 苏轼. 东坡易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3] 李泽厚, 刘纲纪. 中国美学史[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4] 金景芳, 吕绍纲. 周易全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5]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6] 余敦康. 周易现代解读[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 [7] 刘纲纪. 周易美学: 新版[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朱德东, 段文娟)

Attitude of Su Shi toward Villains and Its Philosophical Basis

XU Jian-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Receiving the culti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Su Shi formed the upright and outspoken personality with abhorring evil as a deadly foe since his childhood and bitterly hated the affairs with profiting oneself at expense of others. In experience from changeable rise and fall of officialdom, Su Shi, being good at independently thinking, knew that villains could never be removed and he could not have calm time if he did not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villains. In order to make the nation and society safe, thus, besides eradicating the heinous villains by using gradually changeable methods, those villains with one good behavior should be taught, guided and struggled to make them behave properly. The correct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basis of Su Shi mainly comes from negative-positive philosophy of Zhouyi.

Key words: Su Shi; villain; Zhouyi